

冷战后 日本社会转型

刘洪钟 等编著



■ 辽宁大学出版社

冷战后日本社会转型

刘洪钟 等编著

辽宁大学出版社

◎刘洪钟等 2007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冷战后日本社会转型/刘洪钟等编著. —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2007. 1

ISBN 978-7-5610-5315-7

I. 冷… II. 刘… III. 政治—研究—日本—现代
IV. D731. 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016096 号

责任编辑：崔利波 封面设计：邹本忠
责任校对：金 山

辽宁大学出版社
地址：沈阳市皇姑区崇山中路 66 号 邮政编码：110036
联系电话：024—86864613 网址：<http://press.lnu.edu.cn>
电子邮件：lnupress@vip.163.com
辽宁彩色图文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辽宁大学出版社发行

幅面尺寸：148mm×210mm 印张：7.875
字数：230 千字

2007 年 1 月第 1 版 200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20.00 元

前 言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联解体及原苏东社会主义国家开始向市场经济的转型，导致了自二战结束后形成并延续40多年之久的冷战格局的终结，从而使国际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日本作为当今世界经济大国，其强大的经济技术实力的提升是在冷战时期完成的。而日本从战后的赶超型经济发展模式向成熟的市场发展模式的转型，恰好始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与冷战终结这一历史背景相重合，并且受到了国际关系格局变化的重大影响。正是以内部的结构转型和外部的国际关系格局的重大变化为契机，日本的政治、经济、社会和对外关系在十多年的时间内发生了重大变化。

毫无疑问，日本社会的上述变化将深刻影响乃至决定日本未来的命运，同时还将对东亚的地缘政治与经济，特别是中日关系产生重要影响。中日两国一衣带水，自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以来，两国在各个领域的合作不断加深，彼此间的利益密切交融。但近些年来，中日两国在经济领域的合作关系不断加强的同时，政治关系却由于历史问题的困扰而陷入困境，两国间的相互不信任程度也呈上升趋势。安倍内阁的上台为两国关系的缓和开启了扇窗户，但化解彼此的矛盾仍须付出长期而艰苦的努力。为此，理论界需要加大日本问题的研究力度，多出精品，多出真知灼见。

为了更加全面地把握问题的实质，我们首先必须对日本国内的各种问题有更加深刻的研究和理解，这恐怕是理解中日两国政治与经济关系未来走向的根本。基于这种认识，本书选取20世

纪 90 年代以来日本政治、经济、社会和对外关系的变革作为研究的视角，以期为理解日本问题提供一个比较全面的分析图景。同时，我们对日本早期的社会特征进行了概要式的介绍，这有助于在历史的比较当中理解日本变革时代的发展特点。

本书是一项集体研究成果。刘洪钟为总负责人，刘洪钟和崔岩共同设计了写作的框架。主要执笔者包括刘洪钟、崔岩和刘红。各章的分工具体如下：

第一章：刘红、尤婷婷；

第二章：刘红、朱晓琳；

第三章：刘红、李缨子；

第四章、第五章：刘洪钟、张文佳；

第六章：崔岩；

第七章：崔岩、刘红、刘洪钟。

本书最后由刘洪钟统稿。

刘洪钟

2005 年 12 月

目 录

| | |
|-------------------------------------|-----|
| 第一章 冷战后日本政党政治的变化 | 1 |
| 第一节 冷战时期日本政党政治的特点..... | 1 |
| 第二节 冷战后国际形势的变化与“1955年体制”的解体 | 14 |
| 第三节 冷战后日本政党政治的演变历程 | 22 |
| 第四节 日本政党政治演变的趋势 | 28 |
| 第二章 冷战后日本的政治改革及其影响 | 39 |
| 第一节 选举制度改革 | 42 |
| 第二节 行政制度改革 | 54 |
| 第三章 冷战后日本政治决策体制的变化 | 68 |
| 第一节 明治维新后至20世纪70年代的官僚主导时期 | 68 |
| 第二节 20世纪70年代至冷战结束前政党主导型政治决策体制 | 77 |
| 第三节 冷战后日本政治决策体制的变化及其趋势 | 84 |
| 第四章 日本经济“失去的十年” | 92 |
| 第一节 战后日本经济综述 | 92 |
| 第二节 “失去的十年”的形成原因 | 98 |
| 第五章 摆脱经济停滞进行的结构调整 | 114 |
| 第一节 金融危机前的变革..... | 114 |
| 第二节 桥本内阁与金融危机..... | 121 |
| 第三节 出师未捷身先死的小渊..... | 136 |
| 第四节 力主改革的小泉..... | 143 |

| | |
|-----------------------|-----|
| 第六章 社会结构的变化 | 153 |
| 第一节 人口结构变化及其影响 | 153 |
| 第二节 收入与资产的分配 | 172 |
| 第三节 社会阶层结构的变化 | 186 |
| 第七章 冷战后的日本外交走向 | 191 |
| 第一节 日本的新保守主义思潮 | 191 |
| 第二节 谋求政治大国之路 | 202 |
| 第三节 冷战后日本外交政策的变化 | 224 |
| 参考文献 | 242 |

第一章 冷战后日本政党政治的变化

冷战后日本政治结构的变化主要表现为“1955年体制”的解体以及联合政党的执政。以自民党一党长期执政和自民党、社会党两大政党对立为基本特征的“1955年体制”的解体，曾一度导致日本政治出现混乱、政府频繁更迭的局面。此后，尽管自民党再度占据了日本政治的主体地位，但其以前稳定的主导地位已经不再存在，而必须依靠联合其他政党来谋取执政地位。冷战后的日本政党政治开始进入新的发展时期。

第一节 冷战时期日本政党政治的特点

战后日本政党在资产阶级议会民主制条件下重建，并经历了10年的分化改组，于1955年形成了以自民党为代表的保守势力和以与社会党为代表的革新势力的对峙、自民党一党长期执政的局面，这种政治格局被称为“1955年体制”。这种体制从1955年形成到1993年崩溃，经历了38年的历程。在这38年间，由于自民党一直握有半数以上的议席而长期单独执政，因而又有“万年执政党”之称。而社会党由于其议席数一直徘徊在自民党的一半左右，没有机会掌握政权，因而被称为“万年在野党”。

一、“1955年体制”的形成

(一) “1955年体制”的形成是美苏对立的冷战格局在日本国内的反映

在战后初期，日美关系以敌对为主。战后，作为战败的法西斯阵营一员的日本必须接受盟军主要是美国对其的改造。美军占

领日本后尽管没有废除天皇制，但其占领政策的基本原则是削弱日本的国力，以防其再次对人类和平构成威胁。美国在占领初期实施了一系列“民主改革”政策：处罚战犯、肃清军国主义分子、制定和平宪法、解散财阀、土地改革等。然而，随着美苏对立的国际冷战格局的形成，美国为了推行其全球冷战战略，对日政策由战后初期的“削弱日本”转变为“扶植日本”，其目的是要把日本作为美国在东方的反共堡垒。在二战期间，美苏是与法西斯势力相对抗的同盟国，但是1945年5月德国投降后不久，两国的关系就开始出现裂痕。早在杜鲁门主义、马歇尔计划出笼之时，美国就已经将遏制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作为其全球冷战战略的核心目标。1947年3月，美国总统杜鲁门发表“遏制共产主义向全世界扩张”的宣言，使国际形势急剧紧张起来。1948年秋，随着欧亚国际局势的急剧变化（苏联断然封锁柏林，中国人民解放军对亲美的国民党政权进行战略大反攻，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国际政治力量对比随之发生了重大变化。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东西方冷战发展为局部战争。随着世界局势的变化，美国对日占领政策也相应地发生了变化。为了使日本成为美国在东亚遏制苏联、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的桥头堡，美国政府彻底否定了非军事化、民主化的对日占领政策，转而以全面复兴日本经济作为对日政策的核心目标。正如美国总统杜鲁门所强调的，“中国革命的进展同日本重要性的增长是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①。

美国决策者的反共冷战观也迅速在其对日政策上反映出来。1950年，美国占领当局采取了一系列措施：6月6日，指令日本政府对日共领导人进行整肃；6月20日，指令日本政府解除对军国主义分子和职业军人等的褫夺公职的处分；7月8日，指令日本重整军备、创建警察预备队等等。美国占领当局还指使日本政府通过《破坏活动防止法》镇压民主力量；扶植日本复兴经济，“使日本对远东地区的稳定和繁荣做出积极贡献”。美国扶植

① [日]信夫清三郎：《日本外交史》（中译本），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

日本政策，培植了日本亲美派势力。吉田茂等人上台执政，保护了受到开除公职处分的法西斯军国主义分子，其中极右政治家竟成了保守党的首脑人物。相反，一贯坚决反对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日共进步势力却受到压制。美国占领政策的转变，客观上把日本政界分为亲美势力和反美势力。1955年，与国际上美苏对立的政治格局相呼应，日本形成了保守的自民党与革新的社会党相对立的政治格局。而且由于吉田政权修正民主化改革措施的直接后果压制了工人运动，同时削弱了革新政治势力，从而大大加强了保守政治势力在政治体制中的支配性地位，奠定了保守政党长期执政的基础。

（二）《旧金山和约》和《日美安全保障条约》缔结的影响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国际形势发生了急剧变化，美苏对立，进入“冷战”时期；美国对日政策转变，急欲把日本变成反共防波堤；1949年中国革命的胜利和1950年朝鲜战争的爆发，促使美国加快推行对日单独媾和方针。日本方面则为了尽快结束被占领状态，也极力争取签订媾和条约。第三届吉田内阁成立后，吉田首相不仅在1949年5月就公开声明希望媾和后美国军队仍然驻留日本，而且在1950年2月派大藏大臣池田勇人以“考察美国财政经济”为名访美，私下向美国表示可由日本提出要求媾和后美军驻留日本，以便尽早以多数（片面）媾和的方式缔结和约。虽然美国对吉田拒绝扩充军备不满，但因日本承诺在未来的日美安全保障条约中写入“美军为维持远东的和平与安全，可以使用日本本土的军事基地”，于是同意尽快结束占领。

1951年9月，在美国旧金山召开了片面的对日媾和会议，日本与参加和会的48个国家签署了片面的《旧金山对日和约》。同时，日本政府又与美国政府签署了《日美安全保障条约》，同年10月，日本国会两院审议通过了两个条约。这两个条约的签订决定了日本战后政治的基本方向。《日美安全保障条约》是根据《旧金山对日和约》第六条制定的军事条约。该条规定：“外国武装部队依照由于一个或一个以上的盟国与日本业已缔结之双边或多边协定，而在日本领土上驻扎或驻留。”该条约具有片面

性和军事同盟性两大特征，即日美双方并不负有相互防卫的义务，日本具有单方面承担向美国提供军事基地的义务，美国并不负有防卫日本的义务；另一方面，该条约规定美国有“在日本国内及其附近配备陆、海、空军的权利”，而且该军队可以“镇压一国或两国以上外国煽动或干涉引起的日本国大规模内乱及骚乱”，同时规定日本“为对付直接及间接的侵略”，也要“主动负起自卫的责任”。因此，从国会两院全体会议的表决结果来看，反对《日美安全保障条约》者比反对和约者多，其中增加部分为民主党议员与社会党右派议员。当然，两者的出发点不同，社会党右派是从反对重整军备和提供军事基地的立场加以反对，而民主党是从争取完全独立状态下的重整军备立场反对该条约的。例如，中曾根康弘、园田直等民主党青年干部在国会投票表决之前曾提出将创建自卫军和由联合国确立集体安全保障体制作为赞成《日美安全保障条约》的条件，因这一主张遭到否决，所以在国会表决时投了反对票。重要的是，民主党内的这一动向表明，曾经站在修正资本主义经济体制的立场上同社会党联合执政的民主党，此时却从积极重整军备的立场出发，有条件地支持吉田自由党的内外政策。其动向不仅断绝了与社会党再次合作的可能性，而且也奠定了同自民党携手的基础，从而形成了保守势力的支配优势。

（三）“1955年体制”也是战后日本经济、政治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

日本经济经过战后10年的恢复，到1955年，日本的国民经济主要指标都超过了战前和战时的最高水平。美国占领政策转变后，1949年和1953年两次修改《禁止垄断法》，使“合法”的卡特尔急剧增加，而后财阀子公司集结在本系统银行的周围，逐步形成了新的企业集团。重新崛起的垄断资本，积极要求参与国家政治生活。1952年财界四团体（1947年5月成立的经济团体联合会、1948年成立的日本商工会议所、1948年5月成立的日本经营者团体联盟和1948年4月成立的经济同友会）重新开始活动。这时，左右两派社会党的力量在日本民主运动的推动下迅

速发展。1955年2月两派社会党在大选中共取得156席，远远超过自由党的114席，仅次于民主党的185席，成为众议院第二大势力。财界害怕社会党力量进一步发展，要求保守政党合并，组成“强有力的稳定政权”。1954年10月，日本经营者团体联盟（简称“日经联”）首先做出决议，呼吁自由、民主两党“结成清新有力的政治力量”。随后，“经济同友会”也通过决议，要求两党“迅速实现联合”。四大经济团体在共同发表的《经济界总意》中呼吁道：“为了确立稳定的政权，对付目前困难的国内外形势，应迅速在政治、经济以及其他领域，建立起强有力的体制。”此外，美国也希望日本政局稳定，希望保守党联合。1955年8月，鸠山一郎首相命令日本民主党干事长岸信介随外相重光葵赴美参加日美会谈。据当时美国《新闻周刊》透露，会谈的核心问题是关于日本政治稳定和“保守党联合问题”。岸信介在回忆录中也谈到，此次访美主要谈了自由、民主两党的联合问题。

在上述国内外背景下，继1955年10月13日左右两派社会党统一之后，1955年11月15日，两个保守党即自由党和民主党也实现了联合。鸠山一郎后来在回忆当时情况时说：“这次左派社会党和右派社会党合并了，保守党也势必跟着合并；如果社会党不合并，这边也就很难合并在一起。结果大致上就是如此。”^① 两派社会党的统一是促使保守党迅速实行合并的重要因素。新诞生的自民党，在众议院拥有298个议席，在参议院拥有115个议席，成为日本势力最大的政党。而社会党在众议院拥有156个议席，在参议院拥有118个议席，成为仅次于自民党的第二大政党。由此日本政党政治形成了以自民党和社会党两大势力对立为主要特征的政治结构，这一结构通常被称为“1955年体制”。

二、“1955年体制”的特征

“1955年体制”是以自民党“一党独大制”为基础，以保守

^① 赫赤：《战后日本政治》，航空工业出版社1988年版。

与革新相抗衡为主要特征的政治统治体制。

(一) 形式上的自民党、社会党“两大政党制”，实质上是自民党占绝对优势的“一党独大制”、“一党优位制”^①

虽然日本政体上实行的是资本主义议会民主制，本应该由两大政党自民党和社会党轮流执政，但事实上，在“1955年体制”之下，由于第一大在野党社会党一直没有获得执政地位，这一体制的实质还是自民党一党长期执政的所谓“一党优位制”。自民党从1955年上台执政到1993年8月成立以细川护熙为首的八党联合政权为止，单独执掌政权长达38年之久。在这38年中，除1976年、1979年、1983年大选，自民党在众议院席位有所下降外，大部分年份均保持在271席以上，占众议院半数以上的绝对优势。这种多党制下的一党独大并长期垄断政坛的政治局面在西方政治制度中尚属罕见，是日本特有的一种政治现象。那么，自民党为什么能够单独执掌政权长达38年之久？其主要原因可归纳为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美国的“扶保抑革”政策是举足轻重的外部影响因素。在占领期间，美国先是以“亲美”标准把吉田茂等原亲英美派外交官推向日本政治顶峰，然后又以“冷战”标准把岸信介等甲级战犯嫌疑人“放虎归山”，采取了扶植保守势力、打压革新势力的政策，充当了自民党的坚强后盾。而且1951年旧金山安保体制的确立意味着日本放弃了非武装中立政策，转而依靠与美国结盟来保障国家安全。正是美国的保护和“专守防卫”政策，使日本执政的自民党能够将军费开支减少到最低限度，从而能够集中精力和财力发展经济。经济的高速增长使自民党赢得了民心，巩固了其社会支持基础，社会支持基础的巩固又保证了日本国内政治经济体制的稳定与有效运营。因此，对自民党来说，战

^① 在佐藤诚三郎等著的《自民党政权》中将“一党优位制”定义为：“在先进民主主义国家，长时期在得票和议席方面超过其他政党、占据优势地位的大党叫优越政党，是特定政党单独或在联合政权中作为核心执政政党长期执掌权柄的体制。”转引自徐万胜：《日本“一党优位制”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4页。

后政治经济体制对日美安保同盟的依赖性，不仅确保了它能够在比较稳定的体制下专心实现经济高速成长的战略构想，而且为其保守主义政治统治奠定了合法性基础。

第二，自民党政权的经济发展战略取得巨大成功是取得选民支持的关键因素。首先，在“政府主导型”经济模式下，作为执政党的自民党利用其在全面主导经济和社会发展方面的巨大优势及手中所掌握的公共权力，制订经济发展计划，确立经济发展长远战略目标，对国民经济进行宏观调控，使经济全面协调发展，并保证了政策的稳定性和连续性。通过合理的产业政策，调整了传统的产业结构，协调了各种社会利益关系，维护了社会的整体与长远利益。其次，通过政策的制定，实施利益诱导。20世纪50年代中期，在安保问题上的严重分歧一度动摇了自民党的执政基础。于是，池田内阁于1960年12月制订了《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有意利用该计划将国民的注意力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通过展望日本经济发展前景，增强现行体制的凝聚力，消除政治对立及混乱因素，直接为保守政权实现长期稳定统治服务”^①。20世纪60年代以后，随着日本经济的高速增长，各地区间的社会发展差距急剧扩大，为了保住落后地区的选举地盘，池田内阁采取税制、金融、公共投资补助等特别措施，适当将工业分散到这些地区，提高了这些地区居民的福利，稳定了这些地区的社会支持基础。20世纪70年代，为了防止城市小企业经营者脱离自民党的倾向，自民党政权不顾大藏省官僚的强烈反对，迅速设立了旨在改善小企业经营资金状况、无担保、无保证的融资制度，以获取小企业主的支持。1980年以后，自民党主要通过扩大公共事业投资的方式，对社会各阶层实施利益诱导。此外，自民党还通过建立社会保障制度来扩大自己的社会基础。日本在1955年已把经济恢复到战前最高水平，1968年成为西方阵营第二经济大国。20世纪七八十年代，日本国民中自认为达到中等生活

^① [日]正村公宏：《战后日本经济政治史》（中译本），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水平者达到 90 % 左右，“九成中流”、“一亿总中流化”的说法广泛流行。这种局面使多数日本选民成为现存体制的支持者，对政权交替心存疑虑，因而继续把票投给具有安全感的自民党，才使自民党得以长期单独执政。

第三，善于扩大影响、长于选举策略是自民党长期执政的重要原因。在“1955 年体制”下，日本选民与各政党之间形成了相对稳定的共生关系：自民党主要靠财界的雄厚资金和农村及中小城市的选票；社会党、民社党主要靠工会选票；公明党靠宗教外围组织创价学会的选票；共产党靠其基层组织选票。自民党以雄厚的选举资金作为后盾，靠保护农业政策长期保住了农村选票，并在城市市民中扩大影响，成为具有广泛社会基础的“包容性政党”。同时，日本政治中的“政官财三位一体”结构也有利于自民党的长期执政。所谓“政官财三位一体”，是对战后日本政界、官界、财界相互关系的高度概括，即三者彼此以利益诱导和互换的方式紧密结合在一起的“铁三角”关系（如图 1—1 所示）。在政和官之间，政治家作为个别官厅的代言人展开活动，作为回报，在预算分配的项目落实过程中受到该官厅的优待；在官和财之间，官厅维护财界的个别利益，财界则接受退职官僚来企业就职或赞助官厅难以负担的资金；在政和财之间，政治家保护财界的权益，财界向政治家提供政治献金和选票。由于官界和财界都是日本颇具影响力的政治行为主体，自民党与官僚和财界的密切关系，使得它在与其他政党的竞争中处于一种优势地位。“政官财三位一体”结构不仅使其他政党的竞争和生存空间受到挤压，而且也使得官界、财界在自民党“一党优位制”的存续过程中从整体上排斥了其他在野党，从而取得了政治上的绝对优势。

（二）政府权力的更迭由战后初期的多党轮流执政转变为自民党内不同派系之间的相互更替

日本国宪法规定，内阁首相由众议院确定。1955 年以后，自民党一直是众议院第一大党，自民党总裁理所当然地被确定为首相。而自民党内由于派系林立，总裁通常在党内不同派系的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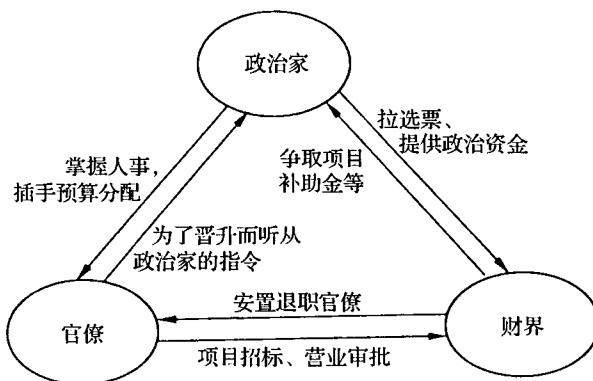


图 1—1 政官财三位一体关系示意图

资料来源：彭曦、汪丽影、汪平：《冷战后的日本政治——保守化的历程》，中国社会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34 页。

袖中产生。冷战时期，自民党内的派系之争代替了国会内部的多党之争。自民党作为由不同利益、不同政策、不同人际关系的集团集合在一起的混合体，一开始就呈现出派系林立的局面。早在 1955 年 11 月自民党成立时，其党内就存在 11 个派别，即自由党系统的吉田派、绪方竹虎派、大野伴睦派，旧民主党系统的鸠山派、三木武吉派、岸信介派，以及旧改进党系统的三木武夫派、松村谦三派、大麻唯男派、芦田均派、北村德太郎派。1956 年在争夺总裁职位的激烈竞争中，各派阀进行了初步的整合，形成了岸信介派、佐藤荣作派、池田勇人派、大野伴睦派、石井光次郎派、河野一郎派、三木武夫派—松村、石桥湛山派等 8 个派阀。20 世纪 70 年代初期，自民党内的 8 个派阀又演变为以福田赳氏派、田中角荣派、大平正芳派、中曾根康弘派、三木武夫派等 5 大派阀为主的新格局。20 世纪 80 年代初至 90 年代初是自民党内一派独大、总主流派体制逐步确立的时期。一派独大是指田中派势力最强，从 1979 年大选起，田中派势力逐步扩张，1983 年大选后形成多达 120 余人的“田中军团”，它和任何一派组合就可以控制众议院的半数以上。1987 年 7 月，田中派演变为竹下登派。此前，继承大平派的铃木善幸派于 1986 年 9 月又

演变为宫泽喜一派，福田派于 1986 年 7 月演变为安倍晋太郎派，而三木派则早在 1980 年 7 月由河本敏夫继承。以竹下、宫泽、安倍为代表的新一代派阀领袖，尽量回避彼此间的对立与抗争，加强了在政权运营方面的“协调性”。1987 年 11 月竹下首相组阁时，任命宫泽为副总理兼藏相，安倍为党的干事长，建立起主流派体制。从派阀领袖世代交替的角度，可以将自民党派阀政治的演变历程划分为“鸠山—岸时代”（1955～1960 年）、“池田—佐藤时代”（1960～1972 年）、“三角大福中时代”（1972～1987 年）和“安宫渡时代”（1987～1993 年）。由于自民党内派阀间的斗争主要是围绕争夺总裁、首相职位及党内人事安排而展开的，因此具有浓厚的“人事派阀”色彩，派系实力越强，该派系担任内阁成员和党内重要职务的就越多。自民党内的这种派阀制度可以通过派阀间的交替、阻止在野党对自民党政权的批判以缓解国民的不满，从而达到维持政权的目的。同时，派阀间的相互对立和斗争间接地反映舆论动向，并被动地完成自民党的政策转变。

不仅自民党派系林立，社会党内部也并非真正的整合统一。1945 年 11 月日本社会党成立时内部就有 3 个派别，即右派系统的社会民众党、中间系统的日本劳农党和左派系统的日本无产党。它们在“大社会主义政党”的口号下联合起来，但其内部成分复杂，政治态度各异。1951 年在媾和和安保问题上，社会党分裂为左右两派。分裂后的左右两派社会党内部政见纷争依然不断，到 1955 年 10 月两派社会党再统一时，其党内就已经有西尾（末光）、河上（丈太郎）、铃木（茂三郎）、和田（博雄）、野沟（胜）及松本（治一郎）等 6 个派阀。20 世纪 60 年代，社会党内围绕“结构改革论”（一种如何在发达国家进行革命的理论，最早由意大利共产党提出）而展开了派阀间的斗争，铃木派内的江田三郎与佐佐木更三因产生意见分歧而分裂为江田派和佐佐木派。同时，“结构改革论”也给社会党各派阀的合纵连横带来变化，原属左派的和田派与河上派、江田派一起形成支持“结构改革论”的左派联合，而佐佐木派则与松本派、野沟派一起形成反